

#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and Anti Japanese Support of Luzhou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ar Area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 Japanese War

Yunhan D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 Abstract

Luzhou, known as the “important town in southern Sichuan”, was a cit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djacent to the wartime capital Chongq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t played a huge role in material support and strengthening the anti Japanese forces due to its inheren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cultural status, as well as its large population and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Luzhou’s strategic position was not a natural result,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ar process, and enemy combat motivation. The heroic deeds of its people leaving Sichuan to resist Japan and migrant workers repairing important military facilities such as highways and airports demonstrated its strong support as a rear area, making great sacrifice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Luzhou’s strategic positio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pair of Lantian Airport, the Sichuan Yunnan Highway, and its support for the Anti Japanese War, gradually taking on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resistance.

## Keywords

Luzhou, strategic position, rear area, Chongqing, anti Japanese support

## 论全面抗战时期泸州在川渝大后方中的战略地位与抗战支援

段云涵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四川南充 637000

## 摘要

素有“川南重镇”之称的泸州，作为与战时首都重庆毗连的沿江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其固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地位，和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在物资保障、加强抗战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泸州的战略地位并非浑然天成，而是由地理区位、战争进程、敌方作战动机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地人民出川抗日以及民工抢修重要公路和机场等重要军事设施的壮举则展现其作为大后方的大力支援，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本文主要介绍泸州战略地位的确立、军民抢修蓝田机场、川滇公路以及对抗战的支援，逐渐担负起全面抗战时期重要大后方的重任。

## 关键词

泸州，战略地位，大后方，重庆，抗战支援

## 1 引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华北、华东沦陷，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川渝抗战“大后方”地位逐渐凸显。泸州位于四川南部长江与沱江交汇处，控扼长江上游，连接川滇黔要冲，成为大后方关键节点。学界对川渝大后方的研究多聚焦于重庆、成都，对泸州关注不足，仅在泸州文史资料选辑中阅读过两篇，且只有纲要形式，如《抗战八年中的泸州》、《泸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地位》，甚至目前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更是尚属空白。然而实际上，泸

州在江防御敌、征兵援前、物资中转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从百万川军出川到军工生产抢修，泸州人力物力持续输入抗战洪流当中，本文以“战略地位”和“抗战支援”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文献史料、报刊、专辑等，多角度分析泸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泸州在军事、交通、人力、宣传等方面的实践，为大后方抗战史研究提供区域视角，从更细致的角度对川渝大后方的战略地位重要性进行补充，展现区域人民抗战贡献，不能遗忘任何一个地区的牺牲与付出，展示伟大的民族抗战精神。

## 2 战略地位的确立

中国的领导人要为持久的抗战做一系列准备，选择战略防御的地方就成为了重要任务。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由此挑起了侵华战争。事变发生后，日军

【作者简介】段云涵（2004-），女，中国四川泸州人，在读本科。

迅速占领沈阳，而国民党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所率东北军撤至关内，这使得日军在短短三个多月内便侵占了东北三省。到1932年，日军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又挑起“一·二八”事变，突然袭击上海的中国驻军，并强行占据闸北，淞沪抗战就此打响。国民党面对强大日军，开始另觅安全之地，根据时局的变动，先后准备将河南与陕西、西北地区作为抗日根据地。然而，由于日军矛头对准华北，加之西北经济落后，物产欠丰，人力资源缺乏，放弃了以上三地。同时，在蒋介石迫使红军入川时期，也考察了四川抗战优势，国民党最终将抗日根据地的考虑选定到四川地区。早在1932年，蒋介石就已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到：“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sup>[1]</sup>这是根据大而弱的中国国情而做出的认识，在面临强敌的进攻，只能守核心，作持久抗战。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就要为持久的抗战做一系列准备，选择战略防御的地方就成为了重要任务。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的演讲时，谈及了四川在全国的地位，“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sup>[2]</sup>。蒋介石还认为：“四川则远处西垂，形势天成，估计当时敌人的实力绝不能深入到四川省来。至于当时四川政治社会的情形，虽不如吾人的理想，然本人认为四川在过去革命史上既有这种光荣的表现，则目前畸形的现象，未尝不可以加速的改变，因此本人仍认为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sup>[3]</sup>。于是，随着华北、华东战局日渐吃紧，蒋介石日益重视四川的战略价值，四川便成为了大后方的最佳选择，他亲自督导川省军政当局推进系列整合举措，加快统一四川政治、整顿军队、改革经济等一系列措施，这一系列动作不仅结束了四川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更使其从地理概念转化为具备完整战争动员能力的后方基地，为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在川渝大后方的战略版图中，泸州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占据了关键地位。这座扼守长江、沱江交汇处的古城，既是连接川南、滇东、黔北的交通枢纽，又是长江上游重要的航运节点。抗战爆发后，泸州迅速成为兵员征集的前沿阵地，川军各部从这里集结出发，沿着川黔公路奔赴淞沪、徐州等前线战场；同时，这里也是后方物资集散的重镇，来自云南的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转运至此，再通过长江航运分拨至重庆及各抗日根据地。更重要的是，泸州的兵工企业在战时紧急扩产，为前线提供了大量枪械弹药，其构筑的江防要塞则成为保护重庆的西南屏障。从兵员输出到物资转运，从工业支援到军事防御，泸州这才成为川渝大后方支撑全国抗战的重要支点。

从泸州历代战争地位来看，其可谓战略要地。泸州自古有“川南重镇”之称，作为西南要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东部与重庆市、贵州省赤水市相接，南部同贵州省毕节、云南省昭通地区相通，西部和宜宾地区相邻，北部与内江、

自贡两市毗邻。是长江航运进入川南、连接滇黔的重要港口。其中，泸州和接壤的重庆自古有着“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这句民谚。从南宋抗元时候，泸州和重庆在战略位置上就不可分开而论。在宋元战争中，蒙古铁骑就有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的观念，拔掉泸州的神臂城与重庆的钓鱼城两个据点就可控制整个四川。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分为前方防御地带、主要防御地带和后方防御地带<sup>[4]</sup>，承担着长江沿线的防守职能。而以泸州合江三座山城为核心的泸南防御体系，处于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后方防御区域深处，更是承担着长江沿线的防务重责。特别是在蒙军突破沱江上游的云顶城、攻占嘉陵江流域的宋军山城之后，泸南防御体系的战略意义更加显著。此时，它不仅直接应对来自岷江、沱江及长江上游的军事攻势，还需时刻防备蒙军“斡腹之谋”的迂回进攻，成为支撑西南防线的重要节点。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蜀帅陈隆之具申朝廷谓：“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sup>[5]</sup>。由此可见，泸南防御体系构成了长江上游地区护卫重庆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尤其地处长江干流凸岸的神臂城，隶属于杨文向余玠所陈《保蜀三策》的下策范畴中“保一江以自守”<sup>[6]</sup>的纽带，连通长江上游的嘉定府与长江下游的重庆城，发挥中转站的作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两地在战略位置上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从日军作战动机来分析，泸州也是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武汉，其下一步主攻目标就是荆襄地区重镇，试图从宜昌打通三峡通道，直指上游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一旦日军攻克重庆，中国将完全被动。日本人为攻下重庆，制定三条路线，一条是山西入关中穿秦岭到汉中，过剑门关到成都平原。但除山西部分据点在日军手中，山西还驻有阎锡山部队，吕梁有大量中共游击队，加上山势险峻，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小国，在中国粉碎其速亡企图后，战时的延长，再加上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走这条战线的后勤补给是一大问题，于是日军首先放弃这条路；第二条路，则是由宜昌攻三峡。日本人认为自己掌握了长江水道的控制，就可以沿水路运输军队以及武器弹药到宜昌，三峡虽然险峻，但突破后即可直抵重庆门户。日军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对宜昌发起攻势，其间集结10万兵力与上百架飞机，发动鄂西会战。此战运用大兵团迂回包抄与正面猛烈进攻的战术，目的在于歼灭江防军，进而直逼重庆。会战中，日军官兵被毙伤两万余人、军马千余匹，15架日机、75辆汽车、122艘船舶及5座仓库被摧毁。经此一役，日军受损严重，实力锐减，丧失了机动作战能力，日本大本营进而废止了原拟调往太平洋战场用以对抗美军的命令。自此，日军再也没有能力针对鄂西及大西南发起同等规模的军事行动，遂转而寻求第三条路线。日本控制长江沿线和沿海线，中国战略物资只能通过陆地运送进来，湘贵铁路和黔桂铁路修通后，日军的第三条路线便是沿这两条铁路打到贵阳。从云贵

高原居高临下进入四川比前两条路线都要容易。具体来说，从云贵高原去四川的一条路是过毕节，沿赤水河而下，到达四川盆地的泸州；另一条则是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而下到达四川盆地的宜宾。日军的两个目的地都在长江边上，且位于重庆上游，是最后的屏障，于是泸州也就成为了江防体系中的核心支点。

### 3 川滇东路与蓝田机场的抢修

为配合政治、军事上的决定，国民政府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明确地放在西南地区，“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sup>[7]</sup>，同时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同时推进”的基本方针，指出当前的生产事业，首要任务是保障前方作战物资的供给。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后方能否持续补充前方的物资，所以在具体实施方针与办法中，关于交通方面有进一步明确要求：国内交通线路要加快增设，如铁路方面——湘桂铁路、川滇铁路、成渝铁路、咸阳至甘肃段等；公路方面，包括兰州经天水、南郑至老河口的各路段，陕甘新宁青等干线，以及川湘段、川滇段等；航空方面：开辟昆明到缅甸和仰光航线，以与英国欧亚航线相联等<sup>[8]</sup>。

由于交通则是抗战时期运输物资的必需，所以国民政府及其重视交通线的修筑。国民政府“为使战时首都与各省交通便利”，“得一国际路线与国外沟通起见”<sup>[9]</sup>，增建铁路和公路，加强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西南地区的公路交通建设尽管起步较晚，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通往云南的交通线被切断，抗日战争必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无法运抵大后方，因而，尽快修通一条连结重庆、云南、缅甸的公路就成为关系抗战成败的紧急任务。抗战时期修筑的川滇、滇缅公路，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被誉为“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川滇公路是连接滇缅国际运输线的主干线，其中由泸州隆昌经泸县、叙永、毕节、威宁至昆明的路段，与滇缅公路相连，又因该路位置偏东，被称为川滇东路。由隆昌至泸县、纳溪、叙永赤水河镇的川滇公路四川段，公路全长272公里，占川滇公路总长的三分之一，所以泸州也是川滇公路上的生命枢纽。这条西南后方的大动脉，修建始于1938年3月10日，限定年底完成。“当时泸县（含今市中区）负责抢修纳溪至隆昌段、全长约76公里、征调民工万多名，分段分区日夜赶修，至7月20日仅1个月零10天，即提前完成、接通了隆昌纳溪”<sup>[10][4]</sup>。此次修筑工作，召集泸县、叙永、纳溪、古蔺等八县的十万民工，自带工具和口粮开始修路，在深山峡谷中风餐露宿、肩挑背扛、攀登开凿、放炮开石。1939年12月，川滇东路全线通车。这条路从昆明出发，仅九百多公里便可抵达泸州，与长江航运衔接。这一路线较从昆明经贵阳至重庆再入长江的路程短得多。自此，大批军援物资便源源不断地运抵泸州，再经长江水道转运至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汽车1万余量、战略物资49万多吨、燃油20万吨、武器弹药20万吨、棉纱布匹3万多吨，通过这条公路运抵大后方，物资被再分配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各大战区和主要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总处设昆明）在泸州兰田坝设分，辖隆昌、叙永、毕节、威宁五个大站。兰田上下两坝，一时机关、仓库、兵站、车场林立，人口骤增，泸州顷刻成为西南巨大的军运中心。

1942年初，仰光陷落后，日军紧接着占领了缅甸，陆上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也随之中断。尽管第十四航空队机场的守卫工作由中国军队承担，中国战区服务团也持续提供住房与食品，却依然面临弹药、油料配件及其他物资的补给难题。此时，开辟新的运输线路以保障中国战场急需物资，尤其是为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供应弹药、燃料及配件，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中美决定开辟印度东北阿萨姆邦的萨蒂亚至昆明、泸州、重庆的中印航线，即驼峰航线，以便即时将抗战援华物资运抵抗战前线。1944年，抗日战争已透露出胜利的曙光，为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国民政府决定在当时的泸州蓝田镇修建一座军用机场。1945年3月10日起，四川省政府先后分两次从泸县、富顺、隆昌、荣昌、江津、合江、叙永等地征集民工八万六千余人，自带工具汇聚蓝田镇的邻玉。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压路机碾压跑道，代以6000余壮汉分为12个小组轮换出工，靠人力拖拉巨大的铁滚对跑道进行碾压。到6月1日，蓝田机场仅用时两个月零四天就全面竣工，在无机器的艰苦条件下，完全依靠人力，耗时两个半月顺利建成泸州蓝田机场，创下了航天史上的奇迹，修建成其作为“驼峰航线”上的三大主要机场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资支持。刘志祥就说到：“该机场建成后，不但外援物资被迅速地不断空运而来，而且我国派出去印、缅的远征军也是从此机场运出，提高了军需物资的即时性和军队运动的快速能力。”<sup>[11]</sup>

川滇公路四川段和蓝田机场的抢修的完成，是泸州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的杰出贡献，为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数十万民工的牺牲和付出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 4 泸州人民对抗战的支援

抗战时期，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从出川抗战、捐资助战到文化抗战，泸州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凝聚成无坚不摧的抗战力量，用后方的默默支持支撑着前线抗战，为国家筑起坚不可摧的后盾。

#### 4.1 兵员动员

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支持。征兵动员中，泸州各界积极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泸州人大抗战，

向抗日前线输送兵源5万人。泸州人奔赴抗日各战区,晋、鲁、豫、赣、苏、皖、鄂、湘、滇及缅甸、印度等国内外20多个地区都有他们浴血奋战的身影。1947年“七七事变”后,泸县率先成立征兵委员会,仅当年就征兵8000余人;合江县在1938年至1945年间,累计输送兵员达到1.2万人;古蔺、叙永等县少数民族青年也踊跃参军。根据《泸州市志》记载,抗战期间泸州地区征募入伍兵员超过26万人。先后参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远征军入缅作战等,据不完全统计,泸州阵亡将士2022人,其中泸县1037人,纳溪县83人,合江县494人,叙永县206人,古蔺县202人。

继1937年几十万川军出川之后。“1939年11月,泸州专署即输送新兵10778名,验收合格人员10240名。1941年又2运输合格新兵6084名,1942年输送4472名、1943年泸州各中等学校青年参军451名。其他自动从军,过境部队自行招兵及投考各级各类军校的还未统计在内”<sup>[10]45</sup>。按1943年至1945年胜利前,由叙泸师管区及泸永师管区分配给泸县新兵名额即有28640名,总计八年抗战泸州输送补充兵员当在50000名以上,所以说,泸州在抗日的人力支援上的贡献真是不小。

#### 4.2 捐资助战

抗战时期,除按规定每年上交征收粮外,泸州农民积极响应抗战号召。1939年川南地区农民自发发起捐献军粮运动,泸州表现尤其突出,“捐献了黄谷9436石、杂粮1700石、法币代金165万多元,捐献两位居川南地区前列”<sup>[10]45</sup>。

在献金方面,泸州更是一马当先。1941年泸州城乡各界发起捐献飞机支援抗战的爱国运动。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踊跃捐款。“该汇款交重庆中国航空委员会,提出购买的飞机定名为泸州一号和泸州二号”<sup>[10]45</sup>,此外,还有抗战名将冯玉祥莅泸发动献金支前运动。《冯玉祥将军与还我河山》中记载到,在赤水河边的合江县城对岸,矗立着一块巨型岩石,石上刻着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亲笔写下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大字旁的跋语是这样写道:“民国三十三年春,余以节约献金救国来合江,此间爱国同胞超越人前,突破各地成绩,为书武穆遗训以作纪念。冯玉祥题”<sup>[12]</sup>,之后,冯玉祥举动得到泸县人民的积极响应,并且成果颇丰,妇女界捐献金戒指127枚;义演活动收入献金7600多元。社会各界捐款总计高达5300多万元法币。这次捐款成为当时四川各县市之冠。

#### 4.3 教育支持

除了兵员、粮钱等方面,泸州在教育文化事业上也作出多方面的贡献,为地下党的隐蔽与存活、为抗日救国力量的推动作出独特贡献。

1938年由恽代英的学生曾子平创建的抗战小学开始筹建,1940年落成于泸州纳溪的风吹岭下,这是国内唯一一座以“抗战”命名的小学,以“学武习文,报效祖国,抗战

到底,光复河山”校训,培养学生并走向抗日战场。

1939年及1945年川南师范学堂两次迁入泸州,作为与战时首都重庆相接的城市,也躲不开日军的轰炸。为躲避日军的轰炸,川南师范学院从泸州城内迁至泸县燕子岩,在战火中坚持办学,为保存教育火种而不懈努力。朱德、恽代英先后担任过川南师范学堂校长,传播革命的火种,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44年刘国瑞受中共南方局委派创办泸南中学,由于抗战时期,一些来往于川、滇、黔边区进行革命活动的同志,没有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和一定职业作掩护,处境危险,加之日军的侵略重伤教育事业,于是泸南中学建成,为川南地区地下党提供隐蔽和联络点,也接受因战争动乱而流落的群众,著名的作家琼瑶就曾在此就读。

#### 4.4 宣传动员

泸州在全面抗战时期多以地下党的抗日宣传为主,广泛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救亡胜利的到来。作为战略大后方交通枢纽,凭借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利用国统区统治缝隙的政治环境,依托内迁工业和本地资源带来的经济与人口基础,顺应广大人民强烈的抗日民意,再加上教育事业得到保护与发展,成功地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

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指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这一点在泸州等地得到了充分落实。在动员群众的方式上,各类民间通俗文艺形式,尤其是地方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动员工作作用显著,应尽量利用之,1937年夏秋间,在泸县城内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川南师范师生组织的两支宣传队,在教师(共产党员)黄觉民的带领下,先后到泸县附近罗汉场、兆雅镇、云锦场、胡市、长滩坝等乡镇宣传抗日救亡,历时一个多月。1938年8月,以扩大抗日爱国宣传为目的,中共泸县县委在中、小学学生中组织了“抗日晨呼队”,队员达两百多人。“晨呼队”以学生积极分子王家福、周德明、尹晴岚等三十余人为骨干,王家福为队长,下设有五个小队。每天早晨,“晨呼队”从各个方向向城内大十字集合,一路上唱起自己编的晨呼队队歌:“祖国在死亡线上,同胞在饥饿彷徨,五千年的民族要翻身,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要反抗……反对一切内战,枪口朝外向,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投降!”。“晨呼队”在大十字汇合后,又从三牌坊登上忠山之巅,在山巅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口号。党的进步青年组织——民先队也积极活动,除了街头宣传外,还协助川师党支部开办了“平民夜校”,把社会上的失学青少年和一些成年人组织起来,一边学文化,一边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织远郊宣传队,沿长江北岸而下,经罗汉、泰安直抵弥陀,转北由兆雅、得

龙铺经石洞返回泸州，沿途向农民讲演抗日救国道理。泸县各学校任教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也借助授课等契合教师身份的途径，向学生宣讲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党的宣传教育下，不少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报考中央军校，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前线。

合江县于1938年春产生了自发组织抗敌御侮宣传的想法。由学生罗大亿、韦代煜约集平时爱唱歌、爱活动的同学数人练唱《五月的鲜花》，在合江纪念“五四”运动群众大会上和会后高歌，赢得了群众的赞扬。会后，同学十多人在学校瞰江楼上，面对汹涌长江宣告抗日宣传队成立，并命名为“洪波歌咏队”。“洪波歌咏队”成立后，经过扩大组织和近一个月时间的排练与准备，于1938年6月首次在合江县城亮相，男女同队同台演出抗日救亡节目，旨在通过歌舞表演来唤起人们的抗日救国情绪，博得受众多国人士的赞赏。

古蔺则由共产党员邓伯明、邓叔明于1937年回到泸州，在古蔺县立龙山五小教书，把一批地下党员请到龙山上，利用课堂课外进行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镇龙山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波及全县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率先组织了抗日救亡歌咏队，在抗日救亡宣传形式上，包括墙报、标语、口号、漫画、街头讲演、唱歌、戏剧等，利用赶集、酒席等机会开展宣传活动。当时的镇龙山有三百多户居民，经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青年学生和民众达两三百人。街头巷尾的标语格外醒目：“抗日烈火已烧到了眉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字句耀眼夺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口号响彻云霄；抗日救亡歌曲广为传唱，抗日宣传队话剧组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捉特务》等剧目也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成效。1938年7月“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古蔺地下党组织牵头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街头游行振奋人心。1942年，廖林生在叙蔺宋三县党组织中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三化”的原则，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和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学会一种独立谋生的技能，结交十个朋友，使得其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用社会职业作掩护，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在抗战时期，中共泸州各级地下党组织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有组织、有计划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斗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直

到抗战取得胜利，迎来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 5 结语

由于泸州的抗战地位，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在四川各县市中遭受日军空袭的次数于全国范围内也极为频繁。泸州的抗战史，既是地理优势转化成战略命脉的史诗，也是一曲平民英雄的壮歌。十二万泸州儿女出川抗日，数十万民工的日夜赶工，青年学生的积极宣传，泸州人民在奋力支前，全面救亡方面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共同书写了“无川不成军，无泸不固渝”的壮丽篇章。本文通过论述四川被选择成为大后方开始，到分析泸州固有地理位置、历朝战争地位、日军作战动机，从多角度阐述泸州重要性，并着重论述了在修建交通设施方面重要贡献以及人民的重要支援，从而得出，所谓“大后方”，并非偏安退路，而是人民共同筑起的生存空间与支援后备的最终结论。自抗战胜利八十年过去，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抗战时期修筑的军工企业多已成为遗址，但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却永远不能忘记。

## 参考文献

- [1]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M].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134..
- [2]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M].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604.
- [3]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14.
- [4] 王琛.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研究[D].北京建筑大学，2018(02):26-28.
- [5]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2005:563.
- [6]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67.
- [7] 重庆市档案馆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工业[Z].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 [8]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M].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608-611.
- [9] 张嘉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178.
- [10] 政协泸州市委员会编.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Z].1995：42-49.
- [11] 政协泸州市委员会编.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Z].1995：35.
- [12] 邹锡汇.冯玉祥将军与“还我河山”[N].四川日报，1984-7-7